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思想研究^{*}

——基于留美生博士论文的考察

肖 玥 邹进文

内容提要: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思想的研究少有利用外文文献资料的成果。作为中国早期研究对外贸易并将西方对外贸易思想引进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他们早期在西方大学的博士论文较少受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以中国近代留美生有关对外贸易方面的博士论文作为主要史料,分中外贸易史、海关与关税制度及国际贸易理论三个方面介绍他们博士论文中的对外贸易思想。

关键词:中国近代 留学生 对外贸易思想 博士论文

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它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由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开其端绪的。早在19世纪初,传教士就开始向中国介绍近代西方国际贸易知识和贸易政策,以期改变清人认知,维持西方国家在华商业贸易利益并改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开始引起国人关注,清末思想家(如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重商主义者)中就有不少人论及国际贸易问题,但他们主要关注国际贸易实务,很少接触到理论问题。

20世纪初以后,对外贸易开始纳入中国高等教育,如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分大学预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三级,其中大学就设有商科,商科分设银行及保险、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三个学门。贸易及贩运学和关税学都与国际贸易相关。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1912年颁布了《学校系统令》等一系列法令,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7科,国际贸易学仍然是商科的独立专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包含商学院,商学院中有国际贸易学系等,国际贸易学开始成为大学的一门学科。

正是在中国国际贸易实务及大学国际贸易学教育等需求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国际贸易理论渐次发展。中国最早从理论上研究国际贸易的是近代留学生。据统计,中国近代留美生完成的博士论文有130余篇,其中以财政、金融方面居多,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博士论文有8篇,这些博士论文构成中国近代贸易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资料收集、翻译和整理等方面的限制,有关中国近代留美生对外贸易思想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深入开拓。^①本文以近代留美生博士论文为主要资料,介绍他们在中外贸易史、海关与关税制度及国际贸易理论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

[作者简介] 肖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武汉,430073。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武汉,430073。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外文经济思想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AJL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有关研究成果如下:李蓉丽的《对外贸易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介绍了朱进的博士论文《中国关税问题》的关税保护思想;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分别研究了施宗树的博士论文《中国对外贸易》、潘序伦的博士论文《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和李卓敏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银汇兑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一文的对外贸易思想;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温斯顿(A. P. Winston)191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 A. O 1916年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德国柏林大学著名汉学家德沃(Wolf v. Dewall)1917年在《国际档案》(*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上发表了对其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罗贝(W. W. Willoughby)1920年在《美国国际法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西奥多·麦克林(Theodore Macklin)1920年在《国际关系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发表了对其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

一、中外贸易史

虽然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比较短暂,但国际贸易实务的历史却十分悠久,中国近代研究国际贸易的留学生有不少致力于中外国际贸易的历史研究,试图从这种历史变迁的研究中总结出对中国当时国际贸易发展有益的启示。

(一)施宗树的《中国对外贸易》

施宗树(Chong Su See,1892—?),福建厦门人,菲律宾华侨施光从之子。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对外贸易》(*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国际贸易问题的专著。他博士毕业后在菲律宾从事商务活动,1925年菲律宾《马尼拉日报》出版公司(The Bulletin Company Inc.)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英文著作《中国问题:中国现存危机的根本原因》(*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China*),分别讨论中国治外法权、关税和关税自主以及治外法权废除的问题,该书扉页上特别标明:“本书作者施宗树——《中国对外贸易》(纽约,1919)一书作者。”该书是1925年11月18—20日《马尼拉日报》上的3篇系列论文的结集本。

施宗树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写到:“人类贸易与文明的演进趋势是从东方转向西方。文明首先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转向地中海,然后再转向大西洋,现在正在向西转向太平洋,现在太平洋正快速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他认为,随着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在见证远东的复兴,有四万万人口和丰富资源的中国成为远东复兴的关键。”施宗树认为,随着中国的复兴,世界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他认为“虽然有关中国的著作很多,但很少是从中国的观点出发论及中国,这些著作大多是以外国作者的价值观而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介绍中国”。基于此,施宗树认为,他写作博士论文的目的就是“追踪自古至今中国与外部世界贸易联系的发展过程,解释影响其进程的因素。”^①

该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861年以前的对外贸易关系”,介绍中国1861年以前的对外贸易变迁情况。包括4章:第一章为“对外贸易往来的黎明时期(从古代至1500年)”。主要介绍中国与亚洲国家特别是邻国的贸易情况,如早期的中朝贸易、中日贸易;公元4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北方动荡而发展起来的通过海运进行的中印贸易;早期阿拉伯商人的来华贸易等。第二章为“与欧洲的早期贸易联系(1500—1833)”。介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拓贸易的历史,重点介绍了中英贸易的情况。此外,还介绍了中俄、中法、中美及中日早期贸易的情况。第三章为“‘闭关’政策”。主要介绍中国采取闭关政策的原因及后果。第四章为“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1834—1860)”。为什么把1834年作为中国对外贸易转折的起始之年?对此,施宗树指出:“1934年是中英贸易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该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贸易合同的终止之年,英国政府受英国当时自由贸易运动的影响,决定终止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将英国与中国的贸易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②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最严重的问题是鸦片贸易,中英冲突引发鸦片战争,并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该条约“开启了中国对外交往史的新时代”,“它是几乎所有影响今天外国在华商业、政治和社会霸权的无数贪婪要求的始步。”^③

第二部分为“1861年以来的对外贸易关系”,介绍1861—1918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包括两章。第一章为“外国统治时期(1861—1918)”。19世纪60年代以后工业革命下的欧洲商品大规模进入中国,“引起中国巨大变化”,本章的目的“就是简要介绍这些变化的历史——特别是其中与对外

① Chong Su Se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19.

② Chong Su Se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p. 114.

③ Chong Su Se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p. 157.

贸易相联系的部分。”^①第二章为“对外贸易的发展”。主要介绍1861—1918年间中国与西方各国商业贸易的发展情况;介绍了中国进出口商品的比重和贸易额、关税变化、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等方面的状况;从船舶吨位、海关税和外国公司及人员在华数量3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的商业条件;对比分析了中国主要贸易商品(包括进口和出口)在1867年和1913年的交易额。

论文的“附录”部分对论及中国对外贸易中涉及的货币(如关两)、度量衡等作了说明,列出了1864—1917年中国历年对外贸易值、海关收入、外国在华公司与人口、中国的通商口岸与市场、中国主要港口的贸易总额以及中国主要产品一览等统计资料。

该论文列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与公法研究”丛书第88卷,1919年在美国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2009年凯辛格出版社(Kessinger Publishing)再版了该书。

《中国对外贸易》一书所描述的中国对外贸易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并无特别之处,许多内容甚至为常识性知识,但它用英文写成并在西方出版,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不无裨益。

(二) 潘序伦的《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

潘序伦(Pan Shu-Lun, 1893—1985),江苏宜兴人,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会计学家之一。1921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不久受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助,进入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学习会计学,1922年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硕士论文题为《中国物价指数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a General Price Index Number for China*)。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和国立暨南学校商学院院长。1927年在上海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是中国最早建立和最有影响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1937年创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潘序伦的博士论文为《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与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通常由该校出版不同,该论文英文版1924年由纽约中国经贸局出版。在论文撰写期间,作者“曾将其中若干章节寄回上海,在当时的上海《大陆报》(*China Press*)英文报纸上发表,见解新颖、文笔畅达,令人刮目,对当时的上海读者产生了很大影响。”^②

该论文引用了大量数据资料,内容非常充实,潘序伦的导师塞利格曼(Seligman)亲自为该书英文版撰写前言。塞利格曼称赞潘序伦的博士论文是“优秀著作”,“已经对中国外贸的兴起与发展进行了详尽、精确的描述”。认为该书“最有价值的贡献也许在于对中国出口美国,及从美国进口的每一种重要货物的详细描述。”^③得到塞利格曼的高度评价,在论文出版时又由塞利格曼亲自写序,这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中是非常少见的。

潘序伦博士论文出版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作为资助潘序伦留学的出资者还特别邀请纽约大学著名货币银行学家、曾为晚清中国币制改革建言的精琪(Jeremiah W. Jenks)作序。精琪充分肯定了潘序伦博士论文选题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这些年来,中、美这两个东、西方最大的共和国之间的各类密切交往越来越多。在这方面,没有其他什么能比撰写有关这两个国家共同利益的论文更有力量了。这一工作由其中一个国家合格的科学代表来完成、并得到了另一个国家最伟大的大学之一的学者和商业人士的热忱合作;这在商业、贸易问题被给予特殊关注的当下尤为重要。”^④

能够得到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作序,这在近代出版的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中是极为少见的,足以说明该博士论文选题的重要意义及其较高的学术价值。

《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全文分4个部分:

① Chong Su Se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p. 182.

② 潘序伦著,李湖生译:《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足迹(代序)”,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③ 潘序伦:《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中译本)“序一”。

④ 潘序伦:《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中译本)“序二”,第1页。

第一部分为“历史描述”，按照时间顺序，作者将接近一个半世纪的美中双边贸易的发展划分为4个时期，然后按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加以介绍。这一部分内容共分5章：“非正式或非条约性交往期(1784—1844)”“暂时扩张和持续下降期(1845—1894)”“局势纷乱和激烈竞争时期(1895—1913)”“快速扩张期(1914—1922)”“快速扩张期(1914—1922)(续)”。

第二部分为“中国输美商品举要”，介绍中国出口美国的各种重要商品的情况，包括4章：“茶叶”“丝绸”“植物油、棉织品”“其他重要商品”。

第三部分为“美国输华商品举要”，介绍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商品的情况，包括5章：“棉织品”“矿物油”“烟草”“木材和木制品”“工业机器和设备”。

第四部分为“美国的对华商业政策及其在华利益”，包括3章：“美国的对华商业政策和对华通商条约”“美国在华投资”“美国银行业在中国”。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概述与结论”中，潘序伦分析了中美贸易的历史背景、整体趋势、前景，复述了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情况和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情况，总结了美中贸易的特点及两国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了中美贸易关系改善的建议。塞利格曼对第四部分和最后一章的评价较高，他指出：“让人非常感兴趣的则是对美国商业政策的描述，以及近期国际银行财团的失败故事。而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潘先生对中、美两个大国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发出冷静而科学的呼吁，希望美方尽可能地在中、美双方合作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①

这是第一部专门探讨中美贸易历史与现状的学术著作，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资料非常丰富，全文列出的各种统计表就多达76个，极具史料价值，是中美贸易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之一。

(三) 吴纪先的《苏联对外贸易二十年》

吴纪先(Wu Chee Hsien, 1914—1997)，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1934年毕业于北平海关设立的税务专门学校，先后在上海、汉口、重庆海关任职。1945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联合国驻上海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经济研究专员，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经济系主任。

吴纪先在哈佛大学师从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教授。里昂惕夫以“投入产出理论”名世，并曾于1928至1929年访问过中国。吴纪先受里昂惕夫影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苏联经济学界的动向比较关注。1947年，他根据“苏联科学研究院经济法权组”1945至1947年上半年出版的学术成果，撰文“撮要介绍苏联学者对最近英美经济学说的评价。”^②吴纪先的博士论文《苏联对外贸易二十年》(*Two Decades of Soviet Foreign Trade*)，无疑受到其早年海关任职经历和其俄裔导师的双重影响。

该论文基于苏联政府以及苏联贸易对象国的官方数据，系统、全面地分析了苏联1918年到1938年间的进出口对外贸易。吴纪先认为苏联对外贸易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苏联国家垄断对外贸易。这种国家垄断的外贸形式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贸易，是一种集体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二是苏联同时在工业和农业发展上取得巨大进步。苏联内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清晰地反映在其对外贸易结构及重要性的变化上。因此，关于工业化发展对国家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苏联的案例极具启示性意义。^③该论文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苏联贸易问题的学术著作。

论文共分9章。第一章“苏联贸易垄断组织”，介绍苏联对外贸易中的垄断情况。苏联的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始于1918年4月，“这种贸易形式的主要特点是对外贸易部门及其贸易代表承担行政和

① 潘序伦：《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中译本)“序一”。

② 吴纪先：《苏联学者目光中的最近英美经济学说》，《中央银行月报》(上海)1947年第11期。

③ Wu Chee Hsien, *Two Decades of Soviet Foreign Trade*,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47, p. 1.

监督角色,而实际外贸交易则由垄断进出口公司进行。”^①1921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内市场允许私人贸易。由于国内商品价格一般高于进口商品,所以国产商品更倾向于自销而非出口。但新经济政策很快被终止,国内贸易再次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实行定量配给之后限制更加严格。

第二章“苏联国际收支平衡总体研究”,考察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作者的研究表明,贸易平衡与黄金流动有紧密联系。巨大的贸易赤字总伴随着黄金大量出口,而积极的贸易平衡总与黄金出口的急剧减少或停止相关。不同于沙皇俄国长期享受外贸盈余,苏联在1933年前多年处于外贸赤字地位。无形收支项目,包括利息和股利分配、旅客消费及个人汇款都不占有重要地位。^②

第三章“苏联进出口产品数量及构成”,分析苏联进出口质量。内容包括对外贸易实物量、国民收入与对外贸易及进出口结构变化等3个方面。苏联进出口商品总值1930年为最高峰,但与1914年前相比仍相差甚远。苏联时期不仅对外贸易额明显低于沙皇俄国时期,而且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较低。当国内生产飞跃增长时,对外贸易却保持较低水平。在进出口商品结构方面,总体而言,因为苏联国内经济的发展,出口中工业产品相对份额增加,农业产品则相对减少;进口中生产资料相对份额增加,消费品则相对减少。^③

第四章“苏联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研究苏联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关系。内容包括生产与进口、经济发展与出口、对外贸易与消费者福利及市场经济与管制经济等4个方面。作者对苏联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生产数据以及进出口产品数据的详细研究表明,苏联政府为通过快速工业化实现国家自给自足付出了艰辛努力。20世纪30年代早期,资本设备的大量进口给国内经济带来巨大压力。国家必须通过增加出口食品和原材料来平衡贸易,使轻工业原料产品的进口大大缩减,导致国内市场消费品供应大量减少。^④

第五章“世界经济萧条及‘苏联倾销’”,研究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于苏联对外贸易的影响。内容包括苏联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苏联经济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贸易条件的变化及“苏联倾销”等4个方面。苏联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比重较小,最高的1931年亦仅为2.5%。^⑤但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其对外贸易同样损失惨重。经济衰退时期,许多国家都抵制苏联倾销,但所谓的“苏联倾销”是指苏联出口产品价格上的大幅削减。作者认为,为了避免国际上的倾销指控,苏联政府可通过贬值卢布的汇兑价值来应对经济危机对苏联对外贸易的冲击。

第六章“苏联参与世界经济会议及国际商品协定”,介绍苏联参与的各种商品贸易协定。内容包括1933年苏联在国际货币与经济会议中的态度、苏联参与政府间商品协定、苏联与卡特尔的关系及结论性意见等4个方面。苏联1933年加入国际小麦协定,1935年加入欧洲木材协议,1937年加入国际食糖协定,此外,还加入诸如碱金属、碳酸钾、火柴等产品的国际贸易协定。

第七章“苏联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研究苏联的国别贸易问题。内容包括苏联对外贸易地理分布的一般格局、苏联的多边与双边贸易、苏联与东方国家的特殊关系及影响与个别国家贸易关系的各种因素等4个方面。在沙皇统治时期,俄国80%的出口与70%的进口对象是欧洲国家。而在1905年俄国大革命之后,俄国与美国和“东方国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蒙古和图瓦)间的贸易增多。

第八章“苏联关税及贸易协定”,分析苏联的关税政策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对苏联对外贸易的影响。除基本经济与地理要素对苏联对外贸易具有决定作用外,其他诸多因素,如政治关系、贸易壁垒、信贷措施和单边支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苏联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凭借国家垄断,苏联

① Wu Chee Hsien, *Two Decades of Soviet Foreign Trade*, p. 2.

② Wu Chee Hsien, *Two Decades of Soviet Foreign Trade*, pp. 11 - 12.

③ Wu Chee Hsien, *Two Decades of Soviet Foreign Trade*, pp. 40 - 42.

④ Wu Chee Hsien, *Two Decades of Soviet Foreign Trade*, p. 47.

⑤ Wu Chee Hsien, *Two Decades of Soviet Foreign Trade*, p. 88.

得以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尤其可以轻易改变对不同国家商品的采购。尽管国家垄断对外贸易,但苏联仍保持较高关税。同时,苏联还与其他国家签订了许多商贸协定。

第九章“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理论及实践”,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问题进行整体分析。内容包括社会主义计划与对外贸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贸易关系及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等3个方面。作者认为,总体来说,苏联经济运作模式与现代经济学家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蓝图相去甚远。本应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近期目标,被迫让步于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国家安全和工业化的长期利益。与创造社会主义福祉原则的相形渐远也同样体现在苏联对外贸易政策上。在可预见的将来,苏联将不会改变实现国家自给自足的目标。如果对国家维持贸易垄断有信心,那么苏联将通过国际协议解决贸易问题,滥用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行为将减少。苏联的边境小国在面对拥有强大势力的苏联贸易垄断机构时,为成功处理与之关系,双边协议是其唯一选择。然而在西方市场,苏联贸易机构并不占统治地位,因而与其他普通大型进出口公司无异。唯一不同的是,每笔交易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加集中且具有连贯性的贸易计划,服务于国家整体。

吴纪先的研究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下的对外贸易运行模式做出了贡献,这为他回国以后开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世界经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本人后来成为中国世界经济学科的奠基者之一。

(四) 郭冲颖的《英国在华贸易:1894—1914》

郭冲颖(Kuo Chung-ying, 1912—1965)是中国近代为数不多的女经济学博士之一。^①她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时受保尔·科纳普朗德教授指导,于1947年完成博士论文《英国在华贸易:1894—1914》(*British Trade in China, 1894 - 1914*),并取得博士学位。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和影响,她并没有像其他男性留学生那样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得到合适的工作机会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她毕业后生平不详,唯一可知的是,她逝世后与其夫合葬于美国华盛顿公墓。

该论文是第一部论述中英贸易史的学术著作。郭冲颖在追溯了英国在华贸易的历史之后,重点研究了1894年至1914年间英国在华贸易变化的情况,她将1894年到1914年间的中英贸易史划分为5个时期,分别介绍了每个时期英国在华贸易的政策及特点,详尽分析了英国对华输出的产品,总结了英国在华贸易的影响,为研究英国在华贸易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第一个时期(1894年到1898年),英国对华贸易在数量和质量上稳步上升。从1894年英国进口产品约值600万两白银,到1898年超过700万两白银。^②中国从英国进口商品中,虽然棉布和羊毛有所下降,但是被不断增长的新进口商品所填补,如电气照明设备、机器、木制品、药品、棉纱和毛线等。贸易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主要反映在机器的大规模引进上,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纺织厂。贸易还带来了中国铁路、城市水厂和水道设施的建设,汽车和自行车开始使用,风俗习惯开始改变。^③

第二个时期(1899年到1901年),英国在华贸易受挫。主要原因为:(1)1899年到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运动期间,商埠关闭,银行停止借贷,使贸易受挫。(2)银价的波动。(3)英国遭遇贸易强敌。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快速发展,令英国在棉、毛等主要出口产品上遇到竞争对手。^④

第三个时期(1902年到1905年),英国在华贸易的恢复。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颁布一系列法

① 中国近代共有6位女性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他5位女经济学博士分别是:192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李美步,其博士论文题为《中国经济史:关于农业》(*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griculture*);1931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吴孟班,其博士论文题为《现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1938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的李德,其博士论文题为《汉口的经济社会》(*Hankau und sein Wirtschaftsleben*);1948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的潘玉璞,其博士论文题为《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and Capital Formation*);1948年获马萨诸塞州拉德克利夫学院博士学位的关淑庄,其博士论文题为《收入、投资和消费的动态研究》(*Simple Dynamics of Income,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② Kuo Chung-ying, *British Trade in China, 1894 - 1914*, Doctoral Dissertation, Wisconsin University, 1947, p. 62.

③ Kuo Chung-ying, *British Trade in China, 1894 - 1914*, pp. 80 - 88.

④ Kuo Chung-ying, *British Trade in China, 1894 - 1914*, pp. 133 - 137.

令,设置商部,任命高级官员管理中国对外贸易事务。1905年,银价达到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最高值,英国对华出口大量增长。^①

第四个时期(1906年到1911年),英国在华贸易衰退。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1)中国受战后影响恢复缓慢;(2)英国进口产品过度积压,超过市场实际需求;(3)1906年至1907年间中国中部地区的饥荒,导致粮价飙升,人民购买力下降;(4)这一时期欧洲及美国的经济萧条影响了英国对中国的产品输出;(5)省政府和私营银行无监管地发行银行票据,使经济局面更加复杂困难;(6)世界棉价普遍上涨,令英国的棉制品价格超出中国大众的购买力;(7)汇率的持续下跌有利于日本产品的出口,而不利金本位国家,如英国的产品出口;(8)1911年发生的洪涝灾害和辛亥革命。^②

第五个时期(1912年到1914年),英国在华贸易再度繁荣。1913年达到顶峰,虽然英国仍在不同领域面对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但在机器的对华输出上,远超其他国家。^③

郭冲颖认为英国在华贸易波动主要受到以下3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英国国内事务的混乱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瓜分和侵占;二是其他贸易商与英国的竞争,包括日本、俄国、德国、法国、美国的贸易商和中国新兴民族企业家;三是中国贸易结算的白银体系。^④

郭冲颖认为,中英贸易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主要贸易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北京等迅速发展扩大。煤矿开采、通讯系统、铁路、蒸汽航运、医药业、海关行政和教育体制等都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机器的进口促进了工厂的发展,进而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⑤该论文的重要不足是对中英贸易史缺乏长时段的分析,将短短的20年分为4个历史阶段有牵强之处。

二、海关与关税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丧失关税自主权,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这一经济主权的丧失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争取关税自主,进行了不懈斗争。1912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美、法、德、俄、日等14国驻华公使,提出修改通商进口税则的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努力提供了契机。1917年3月,中国与德国断交,并制定了《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作为参战条件,其中就要求协约国承认中国进口关税增加五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希望条件说帖》,正式提出关税自主的要求。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再次提出关税自主要求,会议决定就中国关税自主问题召开关税特别会议。20世纪20年代,中国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关税自主运动。为配合关税自主运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关税问题的高潮,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数百篇,还有不少研究关税的著作问世。^⑥正是在此背景下,民国初年,不少留美生也从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着力于海关与关税问题研究,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有3篇。

(一)陈维屏的《清代中国海关的发展:1644—1911》

陈维屏(Chen Wei-Ping,1879—1936),北京人。1895年毕业于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获

① Kuo Chung-ying, *British Trade in China, 1894 - 1914*, p. 134.

② Kuo Chung-ying, *British Trade in China, 1894 - 1914*, pp. 173 - 175.

③ Kuo Chung-ying, *British Trade in China, 1894 - 1914*, p. 228.

④ Kuo Chung-ying, *British Trade in China, 1894 - 1914*, p. 245.

⑤ Kuo Chung-ying, *British Trade in China, 1894 - 1914*, pp. 246 - 247.

⑥ 当时这方面的专著如黄序鹗的《海关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马寅初的《中国关税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北京银行月刊社的《中国关税问题》(北京银行月刊社1923年版);陈立廷的《关税问题讨论大纲》(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25年版);杨德森的《中国海关制度沿革》(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童蒙正的《中国陆路关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陈向元的《中国关税史》(北京:京华印书局1926年版);贾士毅的《关税与国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翻译本有日本人高柳一郎著的《中国关税制度论》(李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学士学位。1911年获美国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硕士学位。1915年获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清代中国海关的发展:1644—1911》(*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1644 - 1911*)。陈维屏“见国事日非,民心日颓,慨然以维持国民教育为己任”,^①回国以后积极在国内从事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并未从事经济学研究。历任金陵大学教授、全国禁烟委员会科长、中央国术馆参事。1932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悉尼总领事。

《清代中国海关的发展:1644—1911》一文共分7章。第一章“封建政府统治方式”,概述清代封建形态的海关特点。清代常关税分为两种:一是设立在沿海和内河的关卡向商船征收的关税;二是设立在陆路和边境的关卡征收的关税。清代海关早期由户部和工部共同管理,后由户部独自管理。征收关税的商品分为4类:衣服、食品、日常用品和杂货。税率分为3种:一是按产地起征不同税率的税收;二是按市价征税;三是按运输距离征税。港口税按船只的长宽大小来征收,不同港口、不同年份,税率也不相同。但各地关卡可按各地需要,在国家制定的关税基础上征收其他杂税。^②

第二章“原始关税税则”,概述中国早期与西方各国对外贸易的关税问题。在介绍中英贸易时,阐述了东印度公司和中英早期签署的贸易协定。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垄断机构是公行。由于清朝进出口关税沉重且项目繁多,公行的商人们会以两种方式对抗当地官员的贪污腐败:一是威胁停止贸易;二是威胁离开广东,去其他口岸经商。

第三章“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分别介绍了《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及其对中国关税制度的影响。《南京条约》及后续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确定了“值百抽五”的从价税原则,严重缺乏弹性,忽略了国内税和中国市场实际情况。《天津条约》进一步增加了外国人的关税特权。

第五章“赫德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时期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是清政府管理海关税务的最高行政官员,掌管全国关税行政及海关人员的任免。1859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任命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为首任总税务司。1863年,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继任总税务司,一直到1909年。赫德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还负责贸易数据公布,管理进口商、各地海关部门,并在北京和广州设立海关学校。陈维屏认为,赫德时期,“总税务司署系统在征收关税之外,促进了不少组织的发展。”^③

第六章“中国海关后期发展”主要介绍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关贸易规则的谈判与修改。

第七章“中国海关未来面临的问题”主要探讨中国海关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陈维屏指出,中国海关未来改革主要面临两方面难题。一是中国人民的天性。中国人历来遵守传统,不爱改变和突破,他们想重现中国过去的辉煌时代,但缺乏创新能力。二是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严重阻碍中国贸易发展。陈维屏认为,应该通过修改法律条规,通过上诉法庭的方式夺回各项主权。基于道德、国家收入和工业效率的角度,“值百抽五”的税率必须调整,应对奢侈品征收高税。^④

这是中国第一部论述中国海关制度及其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学术专著,该书强调要通过改变关税税率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思路,是中国关税思想史上的先声,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但由于该书用英文写成,并不为中国国内所知。晚一年出版的同样研究中国关税问题、同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朱进的博士论文由于被译成中文出版,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① 杨遵矩:《陈维屏先生演说》,《复旦》第1卷第5期(1918年)。

② Chen Wei-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1644 - 1911*, Doctoral Dissertation, Boston University, 1915, pp. 11 - 13.

③ Chen Wei-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1644 - 1911*, p. 73.

④ Chen Wei-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1644 - 1911*, pp. 93 - 95.

(二)朱进的《中国关税问题》

朱进(Chu Chin,1886—?)字进之,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1913年获威斯康辛大学学士学位,次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1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朱进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授业于著名财政学家塞利格曼,其博士论文《中国关税问题》(*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被塞利格曼评价为:“立论公允、切实可行”,该文被“列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丛书之一。”^①

状元企业家张謇与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均为该书中文版作序,对该书给予极高的评价。张謇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余宣言不取保护税主义,书中更先我言之。深切著明,助我张目。其他考证事,批判肯綮,所引皆欧美人之名论。其代我不平者数十年,而我懵不知。我商民、我政府何幸而得此导师于今日乎……方谓事不豫储,无可为计,而朱君则已深致其心力而先事为之,夫是之为经世之业。”^②孟森指出:“中国关税问题一书,已用英文风行于欧美者,译为国文,以饷吾会(即“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引者注),俾刊版以诏全国……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为博士刊行此书,可不谓之天职也欤?国以外先读博士英文原本,早为造成世界舆论之机缄。而内国之人,漠然未有知者,抑重可慨矣。自今请与四百兆同胞共宝爱而诵习之。”^③

该书分两篇11章。上篇分8章,讨论关税制度,“略述其既往之历史,论及我国关税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之缺点,并说明中国边境关税与常关制度、内地税与关税之关系及国家应取之关税政策”;下篇分3章,讨论海关行政,内容包括“税关行政与中国政治主权及经济发达之影响。”^④

第一、二章为“关税史略”。分4个历史时期介绍了中国关税制度的历史变迁:自元明至1843年,为“税制紊乱之时”;1843年至1885年,这一时期“不完全之关税制者,稍稍具备矣”;1885年至1906年,“中国之经济情形实经根本之变动”;1906年以来,“政府如大梦初觉,知过去之非是,而注意及税关税则之改革矣。”^⑤第三章为“政治上之中国关税”。朱进认为当时中国的关税制度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凡有条约之列强,无不享受其利,绝无区别者也。是故各国虽享受中国极端之轻税,且使中国关税主权荡然无存,而中国则竟无能获取相同之权利。”^⑥第四章为“经济上之中国关税”。朱进从经济层面分析关税,认为关税主义即保护主义,“正在变迁过渡之中”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国家通过关税政策加以保护。中国之所以没有制订保护性的关税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列强对于中国“恒施其威赫手段”,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不能早悉欧洲理财之法而仿效之”。^⑦第五章为“财政上之中国关税”。朱进认为,关税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调和经济、增加收入”,“世界各国鲜有能抛弃其财政关税而全行经济关税者也。”他考察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关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其中美国1913年和1914年关税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39%,法国1914年关税占总收入的20%,英国1914年仅进口税即占总收入的22%,德国1913年国内消费税和关税占总收入的45%。而中国当时关税仅占总收入的5.5%。因此,朱进认为,“中国关税之目的,既非保护,又非财政,直无目的者也。”^⑧第六章为“内地税与关税之关系”。内地税与关税的关系具体又分两类:一是进口货与内地税的关系;二是出口货与内地税的关系。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约束下,“外人之在中国购办土货出口者,每许其一次完纳通过税后,遂得免征其他诸税,而华人与其所有之物,无论出口与否,则必桎梏于虐税之下”;“外货入口之与内地税,其情形亦复类是。”^⑨第七章为“边境税关与常关制度”。该章考察了中国边境税关及

① 朱进:《中国关税问题》“自序”,上海: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1919年版。

② 朱进:《中国关税问题》“张序”。

③ 朱进:《中国关税问题》“孟序”。

④ 朱进:《中国关税问题》“发凡”。

⑤ 朱进:《中国关税问题》,第11页。

⑥ 朱进:《中国关税问题》,第41页。

⑦ 朱进:《中国关税问题》,第55—56页。

⑧ 朱进:《中国关税问题》,第70—71页。

⑨ 朱进:《中国关税问题》,第86—87页。

特殊的通商制度——常关制。第八章为“中国之关税政策”。该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关税保护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及美国、日本保护关税的政策。第九章为“海关管理之沿革”，第十章为“海关之组织”，第十一章为“海关行政之一斑”，这三章主要内容为海关行政。

朱进的博士论文对于关税理论，特别是关税保护理论的论述非常深刻、系统，对于中国关税问题的观察很敏锐、提出的改革中国关税方面的建议富有远见。正如1921年觉人在《钱业月报》第1期上发表的《介绍名著：中国关税问题》一文所指出，朱进的论文“能指陈利害，纵论因果，而于各国及中国所应取之关税，犹有独到之见”。

（三）刘廷冕的《中国现代关税政策》

刘廷冕(Liu Tin-Mian, 1897—?)，安徽巢县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1920年获学士学位。翌年，获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硕士学位。之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塞利格曼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于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任教于金陵女子学院、东北大学、燕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担任过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1930年任全国第一个统计学术团体“中国统计学社”编辑。

刘廷冕192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现代关税政策：特别关注中国》(*Modern Tariff Polic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分别研究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六国的关税制度。该文除导论与结论部分外分为两部分，共十章。

导论部分(第一章)从总体上讨论关税政策，包括关税的概念、种类及作用。

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介绍美、英、法、德、日和中國关税发展的历史。美国关税史，除去1789年至1816年和1846年至1860年这两个阶段，其关税制度基本是由保护主义者制定并符合保护主义利益的。英国关税史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1)轻度保护阶段。从1331年爱德华三世始行保护政策到17世纪晚期。(2)高度保护阶段。18世纪开始，英国开始经历工业革命，实行高度关税保护，限制科技和机器的出口。(3)自由贸易阶段。由于长期实行保护政策，英国手工业的效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国内市场饱和，需要更多的国外市场来满足生产需求。于是，英国受国内自由贸易运动的影响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4)反应性保护阶段。20世纪后，由于战争缘故，英国不得不采取一些关税保护措施。^①法国除了拿破仑三世掌权时期，关税保护一直是明文立法。德国除了1865年至1879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实行关税保护。日本关税史共分为3个时期：(1)关税条约时期。自1866年后一直维持5%的税率。(2)部分关税自主时期。1899年，日本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新修条约开始实行，日本获得部分关税自主权。(3)关税完全自主时期。从1911年开始，日本拥有完全关税自主权，开始实行保护关税政策。^②中国在1842年前拥有绝对关税自主权，但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关税主权完全沦丧。

从刘廷冕对西方各国关税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无一不是在关税上实行严格的国家干预，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不是实行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刘廷冕的有关研究对于清末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否定，对于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至第九章，内容为介绍美、英、法、德、日和中國等六国的关税制度。六国关税制度可分为4种：一是单一或通用关税制；二是通用和协定关税制；三是最高和最低关税制；四是协定关税制。使用单一或通用关税制的国家有美国和英国。使用通用和协定关税制的国家是德国和日本，即一个国家使用两套关税制，对部分商品采取通用关税制，对其他商品采取协定关税制。法国是使用最高和最低关税制的国家。最高关税针对所有国家没有享受条约特权的商品，最低关税适用

^① Liu Tin-Mian, *Modern Tariff Polic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24, pp. 11 - 16.

^② Liu Tin-Mian, *Modern Tariff Polic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 pp. 29 - 34.

于从享有互惠条约国进口的商品。中国是协定关税制国家,其关税制度完全取决于其他与之签订条约的国家,没有关税主权,无弹性,无适应性。此外,作者还分别介绍了六国关税的互惠与报复政策、关税种类、区别征税、关税歧视及关税改革的情况。

结论部分,刘廷冕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关税条约加于中国的不公正甚于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的非互惠性规定,因为德国仍然保留了法定的关税,而中国没有关税自主。如果没有一个新的针对中国的关税协议,将来将播下冲突的种子,国际和平将严重受阻。我们播种,我们就要收获。”^①

刘廷冕与朱进同为塞利格曼的学生,该论文将朱进的博士论文列为参考书,有关中国关税问题部分参考了朱进的资料及部分观点。但与朱进侧重于剖析中国关税制度存在的问题不同,刘廷冕主要是介绍国外关税制度情况,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在关税政策运用上的经验。该论文是当时中国所有有关关税问题的论著中对于西方关税制度介绍最全面的,为关税自主运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国际经验。刘廷冕与朱进的博士论文各有特点,两者相得益彰。

三、国际贸易理论

在近代留美生有关国际贸易的博士论文中,李卓敏的最具理论性。

李卓敏(Li Choh-Ming, 1912—1991),广东番禺人。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32年、1933年、1936年分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一直致力于对外贸易问题研究,其硕士论文题为《中国对外贸易最近趋势之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Recent Trend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其博士论文题为《中国银汇兑下的国际贸易:1888—1935》(*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Silver Exchange: China, 1888 - 1935*)。^② 1937年起历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曾任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国代表团专家。1945年后,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联合国驻远东经济委员会常任代表,1947年因被人检举贪污而去职。1951年返回母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兼国际商学系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1963年到香港,筹办香港中文大学,并任第一任校长,后三度续任(共15年),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终身院士。

1935年中国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一直是银本位,而当时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金本位或使用信用货币。银本位制度对国际贸易有何影响?其运行机理如何?对此问题当时西方贸易学家很少关注,“一般泛论认为银汇兑下贸易机能与不兑换纸币下贸易机能,二者实质上并无轩轻,用是此问题无庸缜密之研究”。当时西方贸易理论著作对于银汇兑下国际贸易“稍有研讨者,则更稀如麟角”,如美国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学者陶西格(Taussig)在其1927年所著的《国际贸易》(*The International Trade*)中介绍银汇兑下国际贸易的内容“尚不足十页”,至于安吉尔(Angeli)所著的《国际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ices*)一书中“所费之篇章,则更为短少矣。”^③

李卓敏对上述观点不以为然,他运用中国的经验研究银汇兑下的国际贸易问题。1939年他将博士论文中的理论部分整理成《银汇兑下的国际贸易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silver Exchange*”)一文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53卷第

① Liu Tin-Mian, *Modern Tariff Polic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 p. 130.

② 该论文共8章。第一章“导论”,内容包括:研究的性质和范围;中国的货币本位;1935年以前的中国关税;1888—1935年间中国的若干重大事件。第二章“世界的白银政策与银汇率”,内容包括:银汇兑理论;上海的银汇兑市场;国际支付平衡与银汇率;评论。第三章“货币运动”,内容包括:白银流动理论;白银流动的购买力平价;银汇兑下的国际平衡调整机制;黄金流动理论。第四章“货币运动(续)”,内容包括:1888—1935年间中国货币的年度运动;货币与商品的月度运动。第五章“商品运动”,内容包括:银汇兑下的商品运动理论;中国的商业统计;1888—1935年间中国的商品运动。第六章“分阶段价格变动”,内容包括:银汇兑下分阶段价格行为;1888—1935年间分阶段价格变动;1927—1935年间分阶段价格变动;银汇兑、白银运动及中国银价变动。第七章“易货贸易条件”,内容包括:一般状况;1888—1935年间中国总的易货贸易条件;1888—1935年间中国净易货贸易条件。第八章“结论”。

③ 李卓敏、张延祝:《银汇兑下国际贸易理论之研究》,《经济研究季报》(天津)第1卷第1期(1941年)。下引此文,不再标明出处。

4 期上,1941 年张延祝将其译成中文发表于天津达仁学院主办的《经济研究季报》第 1 卷第 1 期上。

该论文在绪论部分说明了论文的研究旨趣及不兑换纸币贸易与银汇兑贸易的差异。关于论文的研究旨趣,李卓敏指出:“隶属于相同金属本位下之国际贸易业已在经济学文献中论辩无遗,至处银汇兑下之国际贸易,银本位国与金本位国间之贸易机能,实为其症结所在。本文择用‘银汇兑下国际贸易’数字,含意即在此也。”关于不兑换纸币贸易与银汇兑贸易的差异,李卓敏认为其最重要之处在于不兑换纸币汇价相对稳定,而银汇兑“随白银之市场价格每作不停及广阔之变动”。“此种差异,在今后探究贸易机能时,殊予吾人以极大困难”。作者分别介绍了“银汇兑理论”“白银流动之理论”“白银流动之购买力平价说”“银汇兑下调整国际支付差额之机能”“现金流动之理论”“银汇下各级物价之变动”。

通过分析,李卓敏从理论与应用两方面得出以下结论:(1)银汇下国际贸易理论与不兑换纸币下国际贸易理论“大相径庭”,不能“等量齐观”。新古典学派对于银汇兑下贸易机能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运用“购买力平价学说分析,则种种困难皆可迎刃而解”。(2)运用银汇兑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贸易与经济发展现象。一是可以解释近代以来中国贸易入超与白银流入并存现象:“七十年代后,白银由西趋东继续于一方向之流动,究其因,盖源于欧西白银购买力有不断之低降”。二是可以解释中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经济表现:“白银之流入中国,使中国未得遭受 1929 年发端之世界大不景气之痛苦命运。”三是可以解释中国经济落后之因:“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之进展处于停滞不前之阶段,揆其因,半可归咎于仍采行银本位而不思改进所致耳。”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各国纷纷放弃银本位而实行金本位,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纳入金本位体系。但近代中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一直实行银铜复本位制,与世界币制脱轨。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基于金本位制建立的国际贸易理论可能难以完全解释中国的国际贸易问题。李卓敏试图从理论上说明银本位制下的国际贸易问题,无疑具有学术创新价值。

国际贸易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思想来说,直到 20 世纪初还基本上是新生事物,中国古代没有论述国际贸易的论著,清末虽有个别的思想家偶尔提及国际贸易,“但不仅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且真正接触到它的理论问题者几乎没有”,“‘五四’运动以前尚不曾出现过这方面的论著”。^① 民国初年,中国留美生的博士论文开启了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的新纪元。但这些博士论文主要是针对中国国际贸易实务问题(特别是关税保护问题)或者中外贸易的具体问题,大多缺乏理论性与学术原创性。

这些论文有的引起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美国汉学家的关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思想走向世界的先声。如施宗树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后,1920 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西奥多·麦克林在《国际关系杂志》上发表《中国对外贸易》一书的评论文章,认为该书对于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是非常有价值的:“该书已经为影响国际氛围,并最终改变中国现状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② 同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汉学家威罗贝在《美国国际法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历史、经济与公法研究’丛书中,出现了 10 多篇关于中国或与之相关的珍贵的专题论文,而最新添加到这份名单上的,便是施先生所著的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论文”。威罗贝特别比较了施宗树的《中国对外贸易》与 1910—1918 年由马士(Morse)所著的篇幅达到 1810 页的 3 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他认为后者详尽研究了 19 世纪中叶迄 1911 年中国与邻国及西方的政治、贸易关系,而施宗树的论文“给出了许多关于中国商业贸易的具体数据和描述性的信息,这些都是马士的著作中所没有的。而且,施先生的著作还涵盖了马士所没有涉及到的 1911 年以后的内容。”^③

①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59 页。

② Theodore Macklin,“Review: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4 (Apr., 1920), pp. 521 - 524.

③ W. W. Willoughby,“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1/2 (Jan./Apr., 1920), pp. 286 - 287.

朱进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后,1916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对该书作了简要介绍,认为该书是“由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对他们国家经济状况研究所作的一个显著贡献”,“朱博士对中国的关税问题,包括其历史、相关传统和管理作了详尽的介绍”。《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认为该论文的关键论点有三,“第一,低关税对中国的工业发展的帮助是非常不够的;第二,不同寻常的低关税税率的优惠给予外国投资者以极为宽松的条件,中国人则受到歧视;第三,进出口的关税收入与国家的财政制度没有逻辑关系,因为低关税没有带来相应的大量收入,关税税率的刚性使海关收入从服务功能转向补充国家收入。”^①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汉学家温斯顿191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书评,指出“中国财政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某些主要元素实际上是由牺牲中国人利益的外国人设计的”,“它对于中国人的物质的、精神的以及道德的领域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受不平等条约制约的中国关税“既不能达到保护产业,也不能达到获得财政收入的目的,仅仅只是足以支付外国债权人部分债务的工具”。“外商在中国领土上转运商品享受着比它的中国竞争对手低得多的税收负担”。“中国政府无力利用在其他国家是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关税收入,是导致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其他改革失败或受阻的原因”。温斯顿认为“朱博士就此进行的历史和批判性的讨论是非常公平的”,其观点“是敏锐的,具有启发性的,他有关中国贸易自由的讨论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温斯顿也指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认为该书“如果有一个完整的索引和参考书目,将极大提升其价值。”^②德国柏林大学著名汉学家德沃1917年在《国际档案》上发表了评论文章,高度评价该书,认为“《中国的关税问题》一书也值得引起德国的关注,该书表明关税问题是世界政治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政治家、学者及记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应该听一听受过现代教育,冷静客观的中国人是如何从中国人的视角思考这个问题的。”^③

中国近代留美生对外贸易思想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是从经济思想的形态来说,这些以博士论文为主的对外贸易思想文献属于文本形态的经济思想文献,大多数并没有公开发表,而且是用外文写成,因此这些文献大多并没有为近代中国人所知,对贸易思想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对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但是,这些博士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样构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有必要将其进行系统的整理、翻译与深入研究,以丰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内容。

二是中国近代留学生以外文撰成的对外贸易思想文献、特别是其中有关中国对外贸易史及中外贸易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由于是在西方国家完成的,受西方大学收藏中国对外贸易文献不足的影响,在文献的收集、整理方面难免存在不足,甚至存在错误,但这些研究成果,由于运用了对外贸易理论,开拓了中国对外贸易史研究新的学术领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史研究的开端。这些颇具学术价值的文献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关注,通过对中国近代留美生对外贸易思想史的研究,将学术先辈以及他们的学术从尘封的历史中挖掘出来,对那些创造现代对外贸易理论的前辈予以推崇,将他们的学术成果树为典范,既体现了对学术的尊重,也是学术传统的延续,可以扩大学术视野。

三是中国近代留学生的对外贸易思想研究成果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多以中国现实的对外贸易问题作为研究的导向,特别是有关中国近代关税制度及关税改革方面的研究,更是涉及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最核心、最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些博士论文彰显了中国近代留学生学以致用、力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强烈现实观照和学术报国、学术救国的热烈情怀,折射出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取向。

① A. A. O, "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8 (Nov., 1916), pp. 321 - 322.

② A. P. Winston, "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 No. 4 (Dec., 1916), pp. 928 - 930.

③ Wolf v. Dewall, "The Tariff Problem in China",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9. Bd. (1917), pp. 375 - 378.

The Foreign Trade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Xiao Yue Zou Jinwen

Abstract: The relevant study of the foreign trade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rarely apply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foreign literature. Overseas students are the early Chinese group to study foreign trade and to introduce western foreign trade thought into China. Their doctoral dissertations which earned their doctoral degrees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in early times have hardly been paid attention b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cademia. This study is mainl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ata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which related to foreign trade written by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t introduces the foreign trade thought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from three aspects: History of foreign trade, customs and tariff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Key Words: Modern China; Overseas Students; Foreign Trade Thought; Doctoral Dissertations

(责任编辑:高超群)

《清代财政史四种》出版

《清代财政史四种》包括《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清朝嘉道关税研究》(第2版)、《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2版)和《清代关税:1644—1911年》,系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近20年财政史研究的集中呈现,由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相继出版发行。

《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研究了咸同时期财政体制和结构的转变。清廷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依靠农业税、捐输、加派等财政来源已不能满足需求,海关、厘金等新兴工商税成为主要财政来源。作者将其概括为从“国家财政”向“财政国家”的转变。

《清朝嘉道关税研究》(第2版)首次为学界提供了嘉庆道光时期的关税征收序列。作者根据从档案中搜集的常关税额数据,对边疆边贸各关、运河长江沿线各关、沿海各关的税额波动逐个分析。该书认为,嘉道时期的关税征收总体平衡,仍保持在每年500万两左右的水平,相较于乾隆时期没有明显下降。

《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2版)由作者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剖析了漕粮海运制度的产生、运作规制、运输工具等与当时政治、经济、中外关系各层面的关系,以及清代漕粮海运兴衰和废而不止的因由,论述了晚清政府在市场经济生活中职能的转变和决策作用。

《清代关税:1644—1911年》系对清代关税全面的梳理与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关税征收量的变化较为平稳。此后,因西方势力介入,洋关迅速崛起,并带动关税整体飞速增长。清代关税结构与总量的变化,成为中国传统财政体制由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的关键因素。

《清代财政史四种》内容丰富,是清代财政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书中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作者从档案中搜集的大量第一手史料,可供学界参考。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清代财政结构的转型、历史GDP测算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许存健)